

空间政治经济学研究进展评介

周立

(兰州财经大学金融学院,甘肃兰州730020)

摘要:地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是当前中国经济现实中亟需解决的重大问题,而空间政治经济学为经济动态发展与平衡提供了必要的理论支撑。本文从空间政治经济学理论源流出发,梳理了新马克思主义空间政治经济学范畴下的区域产业政策、地区平衡发展、产业结构转型和收入分配优化等相关研究并进行了政策评价。结合当前空间政治经济学理论前沿中的经济均衡发展、城乡均衡发展及空间均衡发展三大研究主题,我国政府应将空间结构思维纳入整体经济发展战略;继续深化市场化改革,培育统一的、自由流动的要素市场;进一步打破城市用地固化刚性政策壁垒;根据资源禀赋来发展符合各地自身比较优势的产业。在动态发展过程中实现人均收入相对均衡,最终达到全局经济立体上的空间平衡。

关键词:空间政治经济学;经济空间结构;空间要素配置;空间经济平衡

中图分类号:F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230(2021)03-0113-13

一、引言

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中国经济整体上取得了长足进步,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GDP排名已由全球国家倒数提升到中上等水平,初步具备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条件,有望成为全球人口最多的高收入国家。与此同时,中国经济空间布局一直发生着剧烈的变化。1949~1979年间,基于国防安全和重工业优先战略的考虑,中国实施了一系列支持内陆发展的战略,如“三线建设”,客观上推动了区域间平衡发展,但其经济效率不高。改革开放后,引进外资和出口导向战略使得沿海地区制造业具备了比较优势,其经济快速崛起。2003年后,党中央国务院先后提出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及中部崛起等重大发展战略,试图将经济资源配置到地理劣势地区,以期缩小东北、中西部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差距,实现全面均衡发展。这一强制行政干预虽带来短暂性地区增长效应,但从长期来看埋下了经济资源空间配置效率扭曲和区域间市场分割的隐患,造成沿海地区要素短缺、生产成本上升以及地理劣势地区投资过度、回报率不高且政府债务高企的局面。若人口户籍制度改革、土地供给政策和城市管理水平等跟不上区域经济发展要求,则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空间经济扭曲现象会更加凸显。

张笑夷指出20世纪至今,世界各国都市化进程和都市经济圈普遍深度推进,“都市社会”替代“工业社会”已成为现代经济发展主脉络,以空间均衡发展为主要特征的经济活动日渐成为主导发展模

收稿日期:2021-03-28

基金项目:甘肃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甘肃‘一带一路’建设发力点与对外开放新格局构建研究”(20YB063)

作者简介:周立(1982—),男,湖北咸宁人,兰州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副教授。

式^[1]。2020年8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指出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依旧突出,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这说明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的空间经济发展范式依旧是当前紧要的理论课题。蔡之兵从空间形成、空间利益、空间竞争与空间接替四个方面进行分析,并从理论和实践角度分别指出政府在产业政策领域中的重要作用,政府实施产业政策应该坚持“重整不重单”“重减不重加”和“重果不重过”三个原则^[2]。邓睽军和龚琴林指出要兼顾“人的繁荣”的空间中性和“地区繁荣”的空间干预两种区域政策才能更好地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3]。陈心颖和陆杰华结合中国城市化进程,从过度集聚、拥挤效应失效和个人意愿三个层面解释了中国城镇体系生长的逻辑,从大城市病和中小城镇病两极化特征分析了中国城镇体系的弊端,以空间经济非均衡力形成机理为切入点,提出中小城镇要构建产业核心集聚力、纠正大城市偏向等政策路径^[4]。

实现区域经济平衡、城乡收入差距缩小及持续稳定高质量发展的目标离不开空间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指导。张可指出城市经济集聚具有促发展和减排排放的双重红利,与低经济密度的分散型空间发展模式相比,都市经济集聚凸显环保效率,澄清了经济集聚加剧城市病的问题^[5];皮亚彬和陈耀指出区域一体化有利于降低地理区位优势地区资源禀赋相对比较劣势,有助于区域间城市均衡发展^[6];陆铭等指出了改革开放至今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三个典型事实:一是区域经济差距呈“倒U型”演变,东西部地区经济差距呈现先缩小后扩大再缩小的演变趋势,内陆—沿海地区经济差距、南北部地区经济差距亦然,具有优势区位条件的地区(沿长江、珠江和沿海港口城市)在空间经济集聚上的扩张性较强;二是中国人口布局 and GDP 空间分布不匹配,城市经济集聚强于人口集聚,东部地区 GDP 份额远高于人口份额,中西部地区 GDP 份额远低于人口份额,东北地区则相差不大;三是城市行政级别越低,其人口集聚越滞后于 GDP 集聚,这很大程度上是要素市场割裂和户籍制度固化及地方政府不恰当干预所致^[7]。邓仲良和张可云指出经济增长的空间分异源于要素结构与产业关联、城市规模与产业结构、市场规模与产业选择匹配机制的不同,这为区域协调发展、经济空间优化和城市产业分工提供了理论依据与经验证据,也为地区经济转型升级提供了政策启示^[8]。

当前,中国经济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而区域经济差距和城乡经济差距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具体体现。若将空间经济结构思维纳入整体经济发展战略,继续深化改革,打破城市用地固化刚性政策壁垒,培育统一的、自由流动的要素市场,各地区根据其资源禀赋比较优势发展自身特色产业,便能在动态发展中达到人均收入的相对均衡,最终达到整体经济立体空间上的均衡发展。在经济发展新时代,建设面向未来的中国特色空间政治经济学已成为实现经济持续高质量均衡发展的迫切需要。

二、空间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溯源

空间政治经济学源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马克思主义系列经典著作里,马克思及其学派代表性学者在空间经济布局上提出了超前的有洞察力的观点。首先,他们认为空间资本化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必然趋势。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中谈到:“一方面,土地因再生产或采掘的目的而被利用;另一方面,空间是一切生产和一切人类活动所需要的要素。不论是生产上还是经济活动上,土地及其上所有物都应该具有空间上的贡献”^{[9](P527-573)}。其次,马克思阐明了空间地理条件对生产资料、资本的流通过程及资本剩余价值的实现具有重要作用。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论及:“创造转移及交换的物质工具——地理运输具体形式,对实现资本增值十分必要。一方面,用空间换市场,用现代交通运输形式(轮船+陆运)可以破除商品交换上的空间限制,把整个世界当作资本家的全球市场;另一方面,用时间换市场,在控制空间运输成本条件下使商品转移到其他地方所耗费的总成本最小化”^{[10](P38-39)}。当然,马克思和恩格斯还觉察到了世界经济发展不均衡所造成的社会阶级对立效应及经济空间结构上的“支配—依附”效应,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使农村(农民)屈服于城市(资本家)的统治”。城市规模越来越大,工业化程度越来越高,农村服从城市,农民服从资本家,半开化和开化国家从属于经济发达国家,东方国家从属于西方国家^{[11](P276-278)}。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空间经济结构富有洞察力的见解是传统马克思主义空间政治经济学以及当

前空间经济学研究主题重要的理论基础和思想来源^[12]。列斐伏尔、福柯和哈维等国内外代表性学者进一步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空间政治经济学。刘鹏飞和赵海月总结了这些学者关于空间政治经济理论的共同认识,特别是都市经济理论上的共通性,第一,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他们认为都市经济受资本增值和资本主义体制的双重制约,都市经济的出现不是单纯的自然生态学过程,而是经济政治空间动态运动的过程;第二,城市经济受到地理位置的制约,港口、铁路枢纽等地理位置变动可能性极低,在地理条件无法改变的前提下,城市经济的崛起受制于资本流动和劳动力的供给,其中资本主导性为首要因素;第三,他们都主张将经济地理条件、经济空间因素加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中,构建出具有空间经济维度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理论框架。具体就是将城市空间产业发展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资本的循环积累过程、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等主要现象紧密结合起来分析,从而研判资本主义背景下的城市化、工业化以及该进程中呈现出来的资本扩张的表征与实质,以期构建空间维度下的政治经济学一般理论^[13]。

列斐伏尔将空间结构、地理条件等生产基本条件加入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中,使其具有空间生产上的异质性和动态性,他创造性地提出了空间生产理论,将空间中的生产(production in space)转变为空间生产(production of space),从过去时间维度上的生产资料连续性扩展到社会空间生产多维性上,明确了(社会)空间要素就是(社会)产品这一核心观点。列斐伏尔还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的扩大化社会再生产过程中最关键的因素“人”作为主要分析对象,指出人口是发展经济的第一要素^{[14](P30-32)}。包亚明则指出列斐伏尔将空间布局当作生产力或生产关系的一部分^{[15](P49-53)}。汪民安进一步指出列斐伏尔的空间观点至少有三个层面:一是物质性的自然空间逐渐消亡,生产性空间经济正在兴起;二是不同社会形态、不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水平下都会衍生出自身独特的经济空间布局;三是若一国空间经济模式是成功的,其他国家则希望复制该模式,但是各国经济条件禀赋有异,不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经济模式,简单复制空间模式,避免不了失败的厄运^[16]。可以看出列斐伏尔提出的空间经济生产中的“人”的关键作用和空间生产运动的规律,不仅坚持和发扬了马克思主义批判、改造资本主义社会之旨趣,也促进了西方经济社会思想结构的改变及新学科的出现,如城市经济学、经济地理学、发展经济学等。

福柯则认为一国或地区的经济空间布局是政府(权力)和市场(竞争)机制共同构成的经济形式,也是空间经济得以呈现各种可能的现实条件,政府权力和市场竞争创造了空间经济^[17]。王丰龙和刘云刚将福柯的经济空间生产分为三个层次:工具性空间生产、生产性空间形成和空间合理性的权衡取舍。工具性空间是统治阶级权力发挥主要作用的空间,在这一空间内统治阶级能看见普通民众生产行为,但普通民众看不见统治阶级使用的权力手段;生产性空间形成则是生产要素(劳动力、土地、生产技术等)在政府权力和市场竞争机制下得以优化配置,形成一个宏微观经济体制和经济布局体系;空间合理性取舍则与哈维的阶级和资本视角相对应,指政府空间设计的权力和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生产性功能之间的权衡与统一^[18]。福柯对空间生产合理性的讨论主要集中于“异托邦”(Heterotopias)分析和“权力—市场边界”的结构合理性的反思,他认为经济空间既不是权力固化的等级概念,也不是无限延展的市场经济布局,而是在政府权力和市场机制作用下的复杂经济体系^{[19][20](P219-258)}。谢欣然指出福柯有关空间经济的论断伴随着权力要素与市场要素的相互作用,其理论分析成为了空间经济理论走向成熟的转折点,但福柯只考察了微观政治中的经济空间,其论证均是有关现实政治及经济中普遍存在的经验性论断,缺乏学理上的实证研究^[21]。

受列斐伏尔将空间经济形态与社会化生产形态联系起来的启发,哈维将时空经济问题置于“社会再生产的物质运动过程”来理解。他指出在一般的货币经济交易中,尤其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本、技术和空间的互相作用形成了无法忽视的经济力量,是一个不断连接的实质性生产过程,基于此,哈维一方面将历史唯物主义引入经济地理学科,推动了经济地理学内部方法论的剧变,为经济地理学转型与更新指明了方向;另一方面,哈维将主流历史唯物主义空间经济理论加入扩大化社会再生产运动中,形成了空间经济理论转向发展的哲学基础,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升级为“历史经济地理唯物主义”^[22]。另外,哈维将空间经济与资本流动、技术创新有机结合起来,主张空间经济要素之间的

关系具有相对联系性而非绝对联系性,资本塑造空间,空间本身也成为资本,技术创新在空间经济运动中发挥主导作用^{[23](P22-24)}。

国内学者对传统空间政治经济学研究进行了拓展和本土化研究。刘生龙和胡鞍钢从交通基础设施角度研究了空间经济布局,认为交通基础设施不仅有助于促进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区域经济均衡发展,还能通过提高区域间贸易来促进我国区域经济一体化^[24]。陆铭指出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要实现经济发展整体协调、经济发展效率趋同与区域经济收敛三个目标之间的平衡,应放弃从计划经济时代至今仍存在的经济资源在区域间均匀分布的“平衡”思想,转而追求城乡和地区之间人均 GDP 意义上的“平衡”思维,这就要求中国更好地实施劳动力、资本、土地、生产技术等生产要素市场深度改革,并促进要素在区域间自由流动,而城市化、工业化与城乡协调发展过程中的户籍政策、土地政策、社会保障政策等因过去政府强干预而存在扭曲的情形需得以真正扭转^[25]。陆铭进一步指出,如果生产要素(特别是劳动力)在区域间能够自由流动,既可以获得由集聚效应导致的生产效率提升,又能够在区域之间实现人均 GDP 或人均收入的平衡发展,进而实现经济上的“空间均衡”,但如果追求地区之间经济总量的平衡增长,其结果往往是空间经济零散不均发展和重复建设,并导致严重的资源错配和经济绩效下降^[26]。

三、新马克思主义空间政治经济学

20 世纪 60 年代末兴起的都市马克思主义(Urban Marxism),凭借空间哲学范式对传统政治经济学理论进行批判和自觉重构,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西方左翼激进思潮关于经济地理研究形态上的转向^[27]。空间因素重构解答了旧马克思主义纯粹从时间维度出发不能解决经济要素空间合理配置的问题,新马克思主义空间政治经济学围绕都市经济及其运行方式展开了区域产业政策、地区平衡发展、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及收入分配结构优化等方面的深刻论证。

(一)区域产业政策

在区域经济中,只要承认地区之间地理条件、自然资源、历史文化传统、市场规模大小存在相对差异,就必然存在不同地区发展不同产业的相对比较优势,而区域产业政策只有遵循地区比较优势才能更好发挥其积极作用^[28]。不同地区具有不同的比较优势,陆铭等指出内陆地区和沿海地区的发展模式应遵循各自比较优势,并提出以下公式:

$$\frac{\text{内陆经济总量(资源约束)}}{\text{内陆地区人口}} = \frac{\text{沿海经济总量(资本、技术)}}{\text{沿海地区人口}} - \text{沿海地区人口规模增加的成本} \quad (1)$$

沿海地区交通便利,大城市数量多,资本和技术禀赋密集,具有发展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比较优势;而内陆地区经济资源总量虽不庞大且大多属人口流出地,但人均资源占有量较高,具有发展资源约束型产业的比较优势^[7]。当沿海地区经济快速增长和内陆地区受制于总量资源时,想要实现相对空间均衡,只能通过人口转移来实现。故在以空间均衡为总体经济发展目标时,各地区要按照其比较优势实施差异化产业政策,同时应保证资金、技术及劳动力等要素的自由流动。陆铭和刘雅丽指出人口流入地通常具有发展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比较优势,通过人才创新效应和人口集聚发挥规模经济作用,提升劳动效率;而人口流出地则更适合发展旅游服务业、现代农业等相关产业^[29]。Wang 等指出应当根据区域要素禀赋差异实施不同的区域产业政策,寻找不同的产品需求领域和对象,通过信息共享和市场交换实现区域间的产业联系,进而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30]。

(二)地区平衡发展

过去中国地方经济发展中存在着行政制度激励政策的干预,以 GDP 增长为核心的官员考核晋升体系,赋予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强大动机^[31]。该制度在改革开放前期发挥了积极作用,但随着地区平衡经济及跨区域市场要素整合的需要,这种激励方式不再有效,往往会促使地方官员实施短期行政政策,追求短期经济增长。Chen 等指出,地方官员的晋升激励显著影响城市建设用地规模及其利用效率,大幅扩张城市建设用地规模能实现短期的经济快速增长,但这种行为可能导致经济发展偏离长期最优增长路径,甚至可能损害长期经济发展^[32]。Barbieri 等指出若官员职业激励与长期工业政

策目标相一致,会促使其从追求单纯的经济增长向解决环境污染等社会问题转变,进而实现长期经济绩效,因此,重振产业政策必须包括对政府能力建设(官员激励制度)的深化改革^[33]。地方官员往往实行与前任官员不同的产业政策,导致产业政策不稳定,产业结构不容易实现帕累托最优^[34]。以经济增长为考核指标意味着地区间存在增长竞争,即GDP锦标赛,使得地区间产业合作空间变窄,不利于经济协调效应及规模经济作用的发挥。为避免地区经济增长幅度落后于其他地区,官员之间可能会采取类似的发展战略,导致地区间产业结构趋同、重复建设和地方政府债务率高等问题^[34]。陆铭指出GDP锦标赛导致经济转移效应,即将制度激励较弱地方的投资和经济增长转移到了激励较强的地方,经济总量上未有有效增长,只是将经济增量进行了重新分配,把如何“做大蛋糕”替换成如何“分蛋糕”,故应制定符合地区产业比较优势的差异化政策,从追求增长速度和数量转变到增长质量和效益上来^[35]。

(三)产业结构转型

产业结构转型是指一国或一地区产业结构高级化过程,并带来集约式、内涵式经济发展。优化城市间产业结构空间布局,实现产业结构协同升级,促进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和合理分配是当前中国应重点关注的产业布局问题。Au和Henderson利用中国不同城市规模测算不同产业生产效率时指出,产业结构不同的城市具有不同的规模—效益曲线,合理的空间产业结构布局可以增进城市产业间的协调性,发挥城市产业比较优势及经济协同效应,有助于中国整体经济高质量发展^[36]。Kolko、Michaels等指出农业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最重要的是优化现代产业空间布局及推动产业结构不断升级,特别是现代新兴产业的协同集聚,使生产技术复杂水平和创新能力快速提高,并在全球产业链的分工与重组中,形成一国产业强大的比较优势及国际竞争力^{[37][38]}。杨青龙等阐明了降低产业综合成本、塑造产业比较优势进而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基本逻辑,指出中国应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积极采取动态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积极推动区域间产业结构协同发展;要素市场扭曲有利于工业的发展但不利于服务业和高新技术行业的发展,各地区要更好地解放要素市场制度束缚,更好地促进要素自由流动,定位好自身动态比较优势,优化地区间产业分工布局 and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路径^[39]。

(四)收入分配优化

收入分配不平等会对一国经济发展造成严重负面影响,高收入者拥有更多经济资源并更容易攫取更多的社会财富,而低收入者受资源约束,获取社会财富较为困难,呈现一国人均收入方面的“马太效应”,当低收入者的人力资本无法有效兑现时,可能会引发社会不安定问题^[40]。林毅夫和陈斌开指出在经济良性发展过程中,一国工业化水平和均衡工资水平会不断上升,企业家与工人、农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将会不断缩小,城市化和工业化本身并不会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分配恶化,但一国政府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鼓励和支持违背本国比较优势而优先发展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将降低劳动力需求,市场均衡工资水平也将下降,这将扩大企业家与工人、农民之间的收入差距;赶超程度越高,收入不平等程度越大,这将限制一国经济长期稳定增长^[41]。贾俊雪和梁焯指出缩小城乡和区域间收入差距应当从完善地方政府治理体系入手,深化经济考核方式、财税体制及收入再分配方式等多方面配套改革^[42]。调整收入分配格局,最主要的还是根据各地域经济资源禀赋条件,因势利导支持符合该地区比较优势产业的发展,提高当地就业水平、完善收入再分配制度,这样城乡间和区域间收入扩大化的难题便可迎刃而解^[43]。

四、当前空间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前沿

陆铭指出目前空间政治经济学的三大基石、三大研究重点是城市发展的理论基础与实证依据、区域发展中的政治经济学逻辑及其关联影响、区域规模经济与市场分割间的相互作用及其对一国经济发展的影响。从这一观点延伸,当前空间政治经济学研究前沿至少包括:解决城乡二元经济、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协调城市化中的建设用地指标、技术分工与劳动力资源配置不协调的问题;实现城市产业发展与人口、资本及土地等要素资源空间布局均衡的问题^[35]。

(一)经济均衡发展

1.城市空间经济。陆铭指出人力资本外部性和技能互补性是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也是现代经济增长的源泉,在一国人口规模既定的情况下,改变人口的空间分布,通过劳动力资源向大城市集聚,借助于城市圈层面的规模经济效应、产业协同效应及技术创新效应,会带动整个国家经济增长^[35]。张笑夷和刘怀玉进一步指出,正确探究城市经济的本质、演变规律及未来前景,必须把握工业化和城市化两条主线的现实路径及未来发展过程^[44]。

关于城市经济在什么条件下会发生升级迭代,刘鹏飞和赵海月指出,当城市空间经济更迭后带来的整体收益大于资本化地租及更新成本之和时,就会发生城市经济更新换代^[13]。在现代城市经济发展和都市空间扩张过程中,不是简单投入经济要素就能达成的。周立斌和杨林指出城市空间经济更迭至少要警惕以下三大陷阱:第一,城市规划要警惕资本霸权,避免空间经济的虚假繁荣及社会阶层公平性丧失;第二,基础设施建设以促进社会公共福利为标准,警惕资本和权力的结合——过度积累的资本(寻租)向次级循环转移造成空间不平等;第三,城市经济发展要避免盲目性,在城市发展规划与国际接轨时,要警惕丧失本土经济特征和文化传统的倾向^[45]。

2.区域协调发展。Fujita等以都市制造业集聚形成的“中心—外围”空间结构为例,说明在“价格指数效应”和“市场规模效应”的作用下,中心城市市场聚焦功能和经济“虹吸效应”的存在,可能使得“中心—外围”区域发展差距进一步扩大,这是现代中心城市经济快速发展和空间快速扩张造成的最直观问题^{[46](P111-113)}。Barrios和Strobl则指出这种区域经济的空间不协调主要源于三个方面:一是空间经济布局与资源环境承载力之间的不匹配;二是经济布局和人口承载之间的不匹配;三是土地资源短缺与建设用地快速扩张之间的不匹配^[47]。各区域城市有自己特定的要素禀赋和产业结构,一旦偏离按产业自身比较优势发展的路径,比如违背经济、社会和生态三者的整体效益最大化原则,就难以实现以人为本的区域均衡发展目标^[48]。Shen等指出区域空间均衡并不意味着“空间平等”,而是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使人口、经济、资源和环境在不同区域之间进行空间合理匹配^[49]。

3.整体经济协同。要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政府在调控时就应避免经济“均匀分布”的误区,避免追求整体上的平衡。为了经济持续增长,除包容性的制度、创新性产业技术、社会福利共享化外,还需要保证生产要素自由投入及有效配置,如自然资本(土地、资源、生态环境等)、人力资本(教育、技能、企业家领导力等非物化的无形资产)和物质资本(存量有机资本)等的积累和投入使用^[50]。国家经济长期发展须兼顾统一、效率与平衡之间的“不可能三角”问题:在一国统一市场中,地区间应按照各自产业比较优势发展,并追求效率最大化,否则要素资源不可能实现空间“均衡分布”——当统一、效率两方面被顾及时,平衡问题则可能出现,自然要素和人口要素在空间上的过于集聚就成为空间经济发展的必然问题。为解决“不平衡”问题用行政力量对要素自由流动强加干预,那么统一、效率二者必然会损失掉其中一个目标,要化解“统一、效率与平衡”的“不可能三角”问题,只能在市场统一、效率优先前提下,发展符合自身比较优势的产业,在要素流动前提下,使人均要素及人均收入取得均衡。概而论之,在统一的国家市场中,经济资源在地区间进行有效配置时,不应存在行政性和制度性的障碍,而应使生产要素在效率原则下自由流动。但若完全靠市场来调节配置资源,效率优先决策也许不是最优决策,当这一情形出现时,政府应当适时加以干预,使产业溢出效应扩大化以及要素资源集中负外部性最小化^[25]。

(二)城乡均衡发展

1.城市化进程。城市化是农业国工业化进程中不可扭转的经济趋势,城市空间经济吸纳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并与城市资本及高技能劳动力优势互补,优化一国经济结构、推动产业结构不断创新。Robert和Lucas指出在城市化进程中,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从生产率低的农业部门转移到非农部门,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定居,提高了转移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水平、劳动生产率和劳动收入^[51]。中国土地城镇化是与人口城镇化相伴的必然过程,对城镇化与农村建设的关系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政府应当从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两方面协调推进^[52]。其中最为关键的是提高土地配置效率,当前土地制度改革的重点是促进非农业用地指标的跨地区交易和增加城市化程度高地区的建设用地指标交易,

还应允许农村宅基地所对应的建设用地指标入市并可进行跨地区交易,让进城务工的农村户籍人口用自己拥有的建设用地指标换取其就业所在地的户籍、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53]。未来中国城镇化、工业化进程的脚步仍将向前迈进,土地制度改革势在必行,故应增加土地制度跨地区交易机制来缓解建设用地不断扩张的趋势^[54]。

2.技术分工。人力资本越来越向大城市群和中心城市集聚,这是市场经济和劳动力自由流动条件下的必然趋势,也是全球经济的普遍状态。人力资本向城市集聚,优化高低技能劳动力结构,形成劳动力分工,有助于提高整体生产效率与合作的有效性^[55]。梁文泉指出当农村人口向城市集聚时,劳动力市场容量增加,劳动分工细化、技能互补,高低劳动力彼此间技能协作更为紧密,拥有不同劳动技能的人会从事符合各自比较优势的职业,高技能劳动力从事低技能活动的机会成本升高,促使高技能劳动力将消费型服务外包以降低机会成本^[56]。陆铭进一步指出市场上不同技能的人按照各自的比较优势进行劳动分工时,高技能劳动力提升自身效率的同时也会带动低技能劳动力生产效率提升,产生互补性,提高劳动生产率。城市空间经济扩张中的人力资本正外部性和技能互补性可以促进经济快速、均衡发展。人力资本外部性会吸引高、低技能劳动力不断由农村向城市、由中小城市向大城市迁移,促使“中心—外围”都市经济圈的出现^[35]。张松林指出当高、低技能劳动力进行分工时,会形成分工经济。城市落户政策限制低技能劳动力落户,低技能劳动力生存成本上升,导致城市人力资本外部性程度降低,且降低幅度随着限制幅度的增大而增大,当限制低技能劳动进入使得高低技能劳动力之间比例失衡时,就不能充分利用劳动分工带来的人力资本外部性,这时城市规模可能出现萎缩。城市人口大量流出由其落户制度和新增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所致^[57]。要想扩大城市空间经济集聚特征,只能通过减少交易成本、生存成本及生活成本来实现。而发展城市经济,对低技能劳动力的不合理限制会导致低级能劳动力缺失,削弱高技能劳动力的专业经济能力发挥,最终导致经济效率与公平兼失的局面^{[35][57]}。

3.城乡统筹发展。当前,中国城市扩张进程中存在损害农村利益的现象,从而导致乡村凋敝。吴宁指出,在中国城市化过程中,城市空间不断扩张,不断挤压农村空间,尤其是城郊地区失地村民被迫卷入城市化进程中,令许多失去农村生产空间的农民游走于城市与农村之间^[58]。周立指出这是中国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造成的。大中城市主要是扩大再生产的工业经济,广大农村则是典型的自给自足小农经济;受严格的户籍制度和流动人口管理制度约束,农村劳动力严重过剩,而城市工业劳动力供给不足。打破城乡发展壁垒,完善城市落户及养老保障制度,将农村过剩劳动力转移到城市,是实现城乡统筹发展、均衡发展必不可少的一步^[43]。在二元经济制度条件下,农村居民人力资本匮乏和户籍制度约束的桎梏如果长期得不到改变,那么城乡居民将无法平等分享经济发展与城市化发展的果实,必须坚定有序地推进并推广我国居民二元户籍制度的改革试验,消解城乡二元经济体制的制度性约束,逐步降低壁垒成本,为农村人口进城务工、部门劳动力转移和落户生活创造公平环境和制度保障,使全体居民平等受惠于经济增长和城市化发展红利^[59]。打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实现城乡融合发展,最终向一元经济结构转化,这是促进经济发展空间均衡化的必要条件,这一进程中不应忽视进城农民保障体系建设,应完善城市积分落户制度及新居民同等福利待遇;通过“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实现农村“人出来,钱进去”和城市“人进来、钱更多”,使劳动力、资金、土地等生产要素在城乡产业空间层次上得以合理配置^[60]。

(三)空间均衡发展

陆铭从空间政治经济学视角指出,中国经济增长率下滑的症结之一在于经济资源的空间错配,行政力量阻碍了生产要素的市场自由流动;区域均衡发展政策被误解,片面追求区域间的总量对等与资源“均匀分布”,引导经济资源配置到效率低的地区和行业,导致资源配置效率恶化、内陆地方政府债务高企和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实现经济的空间均衡及经济持续稳定的高增长,必须解决好土地、人口、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的空间错配问题,使经济在集聚与流动中走向平衡^[26]。

1.城市集聚与平衡。工业化后期,集中主义和分散主义两种布局形态,究竟哪一种更能在工业技术进步背景下推动新城市化及城乡一体化发展,并构建出一种理想的组织模式?资源过度分散

的布局形态会带来诸如社会隔离严重、市场分割、通勤距离过长导致的能源消耗严重及温室气体排放等问题,是不可持续的布局形态,在资源过度集中而市场化改革不到位情况下,城乡二元经济难以做到一体化发展^[61]。赵宏和何芬认为城市空间布局应当和资源规模及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小城市应采取集中紧凑的空间布局形式,大城市为避免功能集聚与运行效率的矛盾,应采取“主城—卫星城(新城)”模式以扩散城市功能,形成“多中心”格局^[62]。蒋希冀等指出健康的城市功能布局是实现城市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功能分区、土地使用、公共中心和企业分布是影响城市功能布局的重要维度,是构建良好空间结构的重要支撑,城市在发展过程中应动态优化调整城市功能布局以解决现实突出问题、适应新的发展需求^[63]。中国各地城市化高速进程中都出现了一定的“大城市病”特征,但“大城市病”并不是城市化本身所造成的。陆铭和冯皓指出人口和经济活动的集聚度提高有利于降低单位工业增加值的污染物质的排放强度,中国当前通过行政手段阻碍人口和经济活动向区域中心城市集聚的政策并不利于实现既定的减排目标^[64]。因此,不能将“城市病”问题简单归咎于城市规模扩大、人口增多等方面。郑怡林和陆铭指出城市人口增多往往会增加城市服务业比重,政府加强城市管理本领及污染处理水平,反而有助于人均排污量下降,城市人多未必会导致大城市病^[65]。陆铭进一步指出人口规模密集、交通拥堵和环境污染这些问题与城市化进程并没有非常强的关系,如果强行控制人口落户及人口流动,可能大城市病问题没有得到有效缓解,反而使城市牺牲了经济效率和社会和谐^[66]。

2. 产业布局与平衡。城市间的专业化分工与协作对产业发展至关重要。Van 等指出在大城市群及多中心城市系统中,必须注意到产业多层次空间布局、产业功能整合性及城市间产业互补性,统筹考虑各城市间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通过合理产业分工来承担相应的经济发展功能,做到“强优补短、聚焦提升”,实现优势互补、错位发展^[67]。对于中国东部沿海城市群、成渝经济圈及武汉都市经济圈等中国重要经济增长极来说,则更要做好国内外产业技术对标,发展自身相对特色优势产业,考虑城市群内空间产业合理性和城市群间产业互补性,实现产业技术的循环累积逐步提升,实现产业经济更高质量的发展。刘胜等指出在规模收益递增、贸易成本和要素流动的共同作用下,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优化有利于促进各城市分工合作,助其根据自身的比较优势生产相应的产品或参与相应的企业生产制造或管理营销等职能环节,由此强化中心城市与外围地区在管理和生产职能维度上的分工专业化水平,有效规避中心城市与外围地区之间在城市职能分工上的同质化竞争,形成功能互补、错位发展、分工协作的空间组织关系^[68]。而在这一过程中,必须要降低不同市场的准入壁垒,特别是要素跨区域流动成本,提高市场准入程度,帮助企业以更低成本获得更高质量的中间投入品或生产性服务,进而促进企业成长^[69]。吴福象和蔡悦指出要改善产业空间布局及产业竞争力,一方面要基于经济系统的开放性,从根本上改变以政策性廉价能源及要素补贴方式支持出口企业参与国际分工体系的传统做法;另一方面要从根本上扭转产业空间布局中市场最优与社会最优偏差带来的福利不公平局面,不断进行要素市场改革,提高劳动力资源、土地供给等要素与产业空间布局之间的匹配能力^[70]。

3. 土地政策与平衡。当前,在中国城乡土地管理政策和建设用地行政配给制度刚性约束下,城市土地供需矛盾在东部沿海大城市之间愈发凸显,沿海和内地城市间的土地要素供需也存在空间错配现象。赵可等指出中国中部、西部一些地区的城市用地铺张已使各区域突破最优规模经济状态,土地要素投入存在冗余现象,与资本、劳动等要素的配置比例并非最优^[71]。张莉等指出城市土地资源错配负向影响了实体经济增长绩效,深化土地市场改革,提高土地资源配置效率,是完善要素市场建设的重要内容^[72]。土地要素投入要因地制宜、对症下药,根据各地空间经济实际情况调配土地资源。王婧等指出新时期应当遵循人口、产业、城镇、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积极推进财税绩效体制改革,合理划定城市空间增长边界,统筹城乡发展,有序推进城乡土地统筹置换^[73]。兰利花和田毅指出国土空间布局优化要体现在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的合理配置上,不同区域的经济资源环境决定了人类开发的强度和规模,须建立生产、生活、生态“三位一体”的空间经济有效规划。土地要素投入与区域产出上的巨大差异是空间经济不平衡的一种体现,也是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主要原因之一,合理的土地布局应当与其单位产出相匹配,有效的土地空间布局方法有助于实现区域间经济平衡发展^[74]。

4. 人口政策与平衡。2003年前后,沿海城市出现“民工荒”和“涨薪潮”,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向

城市转移过程中的“刘易斯拐点”初步显现^[75]。但张丽宾指出当前农民工工资相对于城镇非农职工收入来说差距依旧很大,农村仍然有大量剩余劳动力外移,二元经济仍将长期存在,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刘易斯拐点”并没有到来^[76];周天勇从中国整体城镇化率和城市化水平较低角度,指出农村还有大量待转移的劳动力,农业部门生产率、工资增长率和工业部门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农村劳动力总供给大于总需求,中国人口红利仍然将长期存在^[77]。瞿商和赵俊红指出,从计划经济时代的人口自由增长政策、改革开放时代的计划生育政策到新常态新时期的“单独二胎”政策,再到2015年“全面二胎”政策,中国的人口政策不断变化。目前鼓励生育政策有利于优化人口结构,协调中国经济社会与自然生态环境,是实现经济发展、经济空间均衡的重要一环^[78]。

不同人口规模的城市之间存在协同效应,中国应着力发展特大城市、大城市群及中小城市(镇)的合理空间结构,积极完善农村人口进城的社会保障体系,但也应避免向超大城市倾斜的财政、金融、资本市场和价格政策^[79]。中国特大城市和大城市人口流入强度表现出“强者更强”的马太效应特征,第三产业占GDP比重越高越能吸引人口流入大城市^[80]。张耀宇等指出在政府主导城市化进程中,将城市中决定用地规模的经济活动人口和享有公共物品的户籍人口割裂开来,拒绝让非户籍移民以公共物品的形式分享城市增长中的级差地租收益,地方政府在享有外来人口集聚带来土地收益的同时却不必承担相应的公共物品成本,导致了城市不断扩张、外来人口福利水平却有所下降的局面^[81]。刘欢指出户籍管制对农村流动人口向城市迁移有明显的抑制作用,地方政府为了吸纳高技能人口选择性执行这一政策工具^[82]。在人口城市化进程中,应引入人地统筹的调控思路,消除歧视性政策工具,完善普通人力禀赋劳动者在城市落户政策,有助于人口城市化、人地关系协调及空间产业结构合理化。

5. 资本和技术投入。技术创新和资本投入在现代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日益凸显。技术创新更有可能在城市而非乡村产生,城市在知识专业化与多样性、人力资本积累、信息交流网络形成、市场交易效率以及基础设施等方面的优势使其有利于技术创新的产生及扩散^[83]。城市化进程主要通过促进产业全要素生产率而提高产业技术创新,劳动力流动主要通过劳动要素合理配置而提高资本回报率^[84]。Desmet和Rossi指出发达国家城市空间经济发展水平主要受生产技术水平、经济地理条件、基础设施水平和市政管理水平的综合影响,以上因素综合得分高则城市规模更大^[85]。对于中国来说,城市规模及经济发展水平除受以上因素影响外,还与政策制度因素相关,比如倾斜性的资本投入、财政补贴及贸易便利性等^[86]。

蔡昉和都阳指出中国现代城市诞生不同于西方国家市场力量的自发生成机制,其既依靠市场经济力量(包括地理条件、历史文化遗产及城市资本生成能力等),又依靠政策再分配资源能力(行政级别和金融财税政策倾斜等)^[87]。中国西部地区在城市发展模式上明显别于东部沿海城市,行政分配资源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市场要素无法有效运转,扭曲中国整体城市化格局。为此,要进一步取消户籍限制,加速人口合理配置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和完善市场化条件下的城市空间布局。陈诗一等指出中央层面和国有金融机构的政策倾斜造成了资本配置扭曲,即一部分城市的资本供给过剩,另一部分城市资本短缺^[88]。另外,地方政府限制性政策在城市与农村、市级与县乡间造成天然割裂,使得行政级别高的城市优先发展。政策性资本配置扭曲是导致中国大城市偏少、小城市发展不足的重要原因,消除资本配置扭曲可促进城市—乡村劳动力合理流动及配置,促进中国城市产业技术创新和空间经济布局优化,提高全体社会福利。

五、总结及展望

空间政治经济学是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为先导的、以主流经济学理论为核心的,研究空间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经济学科^[89]。空间政治经济学主要以农业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人口、土地、技术、资本等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为研究课题,试图找到打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缩小城乡人均收入差距、优化一国区域空间产业结构、实现区域经济空间均衡及一国经济长期发展的答案。城市化进程中空间生产要素有效投入可以实现更高的经济总产出,并提高一国资本(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水

平和资本(生产技术、人均工资及金融资本)回报率,是现代经济增长的引擎。协调一国区域经济平衡发展,要打破要素不能自由流动的壁垒(户籍和城市用地制度),培育统一的市场,加速区域经济“在集聚中走向平衡”。中国是个地理自然禀赋差距极大的国家,中西部城市土地政策偏宽松、东部沿海土地供给过于紧张,部分地区未按自身产业比较优势进行发展,造成城市规模和产业规模偏离最优布局,进而导致国家层面的经济资源误配和地方政府债务高企的局面,不利于一国经济持续增长^[35]。

区域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可从空间政治经济学理论中寻求解决之道。大量学者将空间计量方法运用到政治经济学的前沿课题上,以现实数据佐证了空间经济平衡发展理论的正确性。Gibbons 和 Overman 设计了劳动力自由流动与城市经济崛起标准空间计量模型,其开拓性实证研究范式,为空间政治经济学实证发展指明了方向,并得出人力资本是城市经济崛起的首因之结论^[90]。Annoni 等评估了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欧盟两组不同国家(传统资本主义国家和转轨国家)的空间经济增长模式的差异,通过比较两组国家城市的劳动投入产出弹性,发现长期内两组国家政治制度空间上的安排会使得经济趋同化发展,但在危机期间,在不同的空间制度下,两组国家的经济增长决定因素不同、城市经济中资源优化配置方式不同,其劳动力产出效率也不相同^[91]。Kim 等利用空间计量模型估计了城市集聚功能对一国整体生产率的影响,其研究结果显示,城市集聚经济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显著,城市集聚有助于产业技术创新和劳动分工,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城市经济资源合理配置使得大城市圈中的大小城市生产效率趋同,区域经济产生了明显的空间互补效应^[92]。国内学者在城镇化和就业、城市与区域经济均衡等方面也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孙叶飞等检验了新型城镇化发展与产业结构变迁的经济增长效应,指出实现产城联动,发挥新型城镇化与产业结构变迁的“协同效应”,对缓解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结构性减速”问题、促进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具有积极作用^[93]。罗胤晨等指出 2003~2012 年间,长三角城市群县域工业经济呈现“集聚—扩散—再集聚”的空间演化过程^[94]。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在城市化和工业化水平不断提高过程中,经济总量和质量大幅飞跃,在人均收入快速提高的过程中,人口和经济总量一直存在向特大城市和大城市群集聚趋势,该趋势至今未变,以致形成了“大城市病”,通常人们认为病因在于产业集聚、人口集聚及其他资源集聚。囿于空间经济发展模式认识上的偏差,大城市和城市群的基础性功能一直未得到正确对待,“大城市病”的根本原因在于政府基础管理能力不足、城市基础设施水平不完善和限制性政策壁垒等,而这些根本原因被选择性忽略了^[66]。从空间经济理论和全球现实经验来说,“在集聚中走向经济新平衡”是一个基本规律,建设完善的要素自由流动市场、打破城市刚性用地制度等壁垒,可使当前集聚效应集中于少数城市的局面得以缓解,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兼顾效率和平衡。陆铭进一步指出,中国经济从高增长阶段转入中高增长阶段,不仅受经济周期和国际经济形势的影响,更是国内经济政策长期扭曲所带来的结果,需要进行深层次供给侧改革,从生产要素市场的结构性和体制性问题入手,并深入推进用地制度和户籍制度改革,一方面,让地方政府竞争行为更符合国家的整体长期利益,另一方面,需要通过法律和市场两个机制,有效约束地方政府行为。深入研究空间政治经济学、掌握空间政治经济学发展脉络及其研究动态对化解中国当前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大有裨益^[95]。

当然,空间政治经济学仍需进一步发展,有许多现实问题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区域间平衡发展与跨区域经济制度之间如何协调?要素市场化改革虽能缓解大城市用地困难,但会不会出现大城市和区域中心城市的“攫取性”过度索取行为?“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结合点和有效边界如何确定?是否会产生新的非正式制度对市场分割影响?这些都是当前及未来一段时期空间政治经济学需要解决的课题,这也是空间政治经济学未来发展的方向。

当前,虽出现人口出生率大幅下降的局面,但可通过提高城市化程度和促进生产要素自由流动来优化我国产业结构和扩大产出。因此,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首先,要提高我国劳动力自由流动水平和合理配置水平、完善城市户籍制度和提高人口教育水平,持续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高素质的劳动力;其次,要加强用地市场改革,协调东部沿海城市用地紧张、中西部城市用地较宽松的局面;再次,引

导各地发展符合自身比较优势的产业,以求各地区人均 GDP 空间上的平衡;最后,加强向生态保护及不适应发展工业地区转移支付力度,着力解决部分地方债务高企的困局。面对百年未有之变局,中国需要全面深化改革,打破政策性行政刚性壁垒,建设统一有序、自由流通的要素市场,加强东部沿海大城市群与中西部城市群间的协同发展、促进各城市群中心—外围空间经济布局合理化,加强城乡间、地区间的产业分工协作,在追求经济集聚中实现空间上的“平衡”,实现可持续创新发展的国家战略。

参考文献:

- [1] 张笑夷.空间政治经济学批判:对象、方法和任务[J].社会科学文摘,2020,(1):82—84.
- [2] 蔡之兵.空间经济学视角下的产业政策研究[J].经济学家,2017,(9):20—26.
- [3] 邓睽军,龚琴林.中国区域政策的空间属性与重构路径[J].中国软科学,2018,(4):74—85.
- [4] 陈心颖,陆杰华.空间经济学视角下城镇结构失衡及其均衡化路径选择[J].东南学术,2018,(4):123—131.
- [5] 张可.经济集聚的减排效应:基于空间经济学视角的解释[J].产业经济研究,2018,(3):64—76.
- [6] 皮亚彬,陈耀.大国内部经济空间布局:区位、禀赋与一体化[J].经济学(季刊),2019,(4):1289—1310.
- [7] 陆铭,李鹏飞,钟辉勇.发展与平衡的新时代——新中国 70 年的空间政治经济学[J].管理世界,2019,(10):11—23.
- [8] 邓仲良,张可云.中国经济增长的空间分异为何存在?——一个空间经济学的解释[J].经济研究,2020,(4):20—36.
- [9] 恩格斯.论住宅问题[C]//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27—573.
- [10] 马克思.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C]//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38—39.
- [11]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C]//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76—278.
- [12] 武剑,林金忠.马克思主义空间政治经济学:研究进展及中国启示[J].江苏社会科学,2013,(4):76—83.
- [13] 刘鹏飞,赵海月.空间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城市更新[J].学术月刊,2016,(12):135—139.
- [14] Lefebvre, H. The Production of Space[M].Oxford: Blackwell, 1991.
- [15] 包亚明.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 [16] 汪民安.空间生产的政治经济学[J].国外理论动态,2006,(1):46—52.
- [17] 郑震.空间:一个社会学的概念[J].社会学研究,2010,(5):167—191.
- [18] 王丰龙,刘云刚.空间生产再考:从哈维到福柯[J].地理科学,2013,(11):1293—1301.
- [19] 米歇尔·福柯.另类空间[J].王喆,译.世界哲学,2006,(6):52—57.
- [20] 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M].刘北成,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
- [21] 谢欣然.权力与知识的空间化——福柯理论中的空间层域关系研究[J].陕西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4):19—23.
- [22] 林密.空间转向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空间化——以列斐伏尔、哈维为中心[J].江西社会科学,2017,(9):47—54.
- [23] 大卫·哈维.新自由主义化的空间——迈向地理不均衡发展理论[M].王志弘,译.台北:群学出版社,2008.
- [24] 刘生龙,胡鞍钢.交通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中国区域差距的视角[J].中国工业经济,2010,(4):14—23.
- [25] 陆铭.求解“不可能三角”:理性、公正与效率[J].探索与争鸣,2015,(10):64—68.
- [26] 陆铭.中国经济的症结是空间错配[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1):77—85.
- [27] 温权.政治经济学批判语境中都市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经典论域[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1):35—45.
- [28] 陈钊,熊瑞祥.比较优势与产业政策效果——来自出口加工区准实验的证据[J].管理世界,2015,(8):67—80.
- [29] 陆铭,刘雅丽.区域平衡发展:中国道路的“空间政治经济学”思考[J].广西财经学院学报,2019,(4):1—10.
- [30] Wang, S.L., Chen, F.W., Liao, B., Zhang, C.J. Foreign Trade, FDI and the Upgrading of Regional Industrial Structure in China:Based on Spatial Econometric Model[J]. Sustainability, 2020, 12(3):1—16.
- [31] Li, H.B., Zhou, L.A. Political Turnover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The Incentive Role of Personnel Control in China[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04, 89(9):1743—1762.
- [32] Chen, Z.G., Tang, J., Wan, J.Y., Chen, Y. Promotion Incentives for Local Officials and the Expansion of Urban Construction Land in China: Using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as a Case Study[J]. Land Use Policy, 2017, (63): 214—225.

[33] Barbieri, E., Tommaso, M., Pollio, C., Rubini, L. Industrial Policy in China: The Planned Growth of Specialised Towns in Guangdong Province [J]. Cambridge Journal of Regions, Economy and Society, 2020, 12(3): 401—422.

[34] 赵新宇, 郑国强, 万宇佳. 官员激励、要素市场扭曲与产业结构升级 [J]. 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 (6): 159—166.

[35] 陆铭. 城市、区域和国家发展——空间政治经济学的现在与未来 [J]. 经济学(季刊), 2017, (4): 1499—1532.

[36] Au, C., Henderson, J.V. Are Chinese Cities Too Small? [J].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2006, 73(3): 549—576.

[37] Kolko, J. Urbanization, Agglomeration, and Coagglomeration of Service Industries [Z]. NBER Chapters, 2010.

[38] Michaels, G., Rauch, F., Redding, S.J. Urbanization and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12, 127(2): 535—586.

[39] 杨青龙, 金磊, Jeeseon, H. 综合成本变化对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基于产业比较优势的中介效应 [J]. 江淮论坛, 2020, (5): 65—74.

[40] Balcilar, M., Akadiri, S.S., Gupta, R. Partisan Conflict and Income Inequa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A Non-parametric Causality-in-Quantiles Approach [J].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2017, 22(5): 1—18.

[41] 林毅夫, 陈斌开. 发展战略、产业结构与收入分配 [J]. 经济学(季刊), 2013, (4): 1109—1140.

[42] 贾俊雪, 梁焯. 地方政府财政收支竞争策略与居民收入分配 [J]. 中国工业经济, 2020, (11): 5—23.

[43] 周立. 中国改革开放与经济学派源流: 1978—2018年 [J]. 广东财经大学学报, 2019, (4): 18—32.

[44] 张笑夷, 刘怀玉. 作为一种城市研究范式的“都市马克思主义” [J]. 学术月刊, 2020, (3): 34—42.

[45] 周立斌, 杨林. 空间政治经济学对我国城市发展的启示 [J]. 经济研究, 2014, (4): 107—111.

[46] Fujita, M., Krugman, P., Venables, A.J. The Spatial Economy: Cities, Region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M]. MIT Press, Cambridge, 1999.

[47] Barrios, S., Strobl, E. The Dynamics of Regional Inequalities [J]. 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 2009, 39(5): 575—591.

[48] Lu, Dadao. The Macro-Strategy in the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China [J]. The Journal of Chinese Geography, 1991, (1): 1—15.

[49] Shen, H.Y., Teng, F., Song, J.P. Evaluation of Spatial Balance of China's Regional Development [J]. Sustainability, 2018, 10(9): 103—142.

[50] 林毅夫, 王燕. 以比较优势作为南南合作互利共赢的指南 [J]. 区域与全球发展, 2018, (5): 5—23.

[51] Robert, E., Lucas, Jr. Life Earnings and Rural-Urban Migration [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04, 112(1): 29—59.

[52] 孟繁瑜, 李呈. 中国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协调统一发展研究——国家土地政策的负外部性路径依赖分析与破解 [J]. 中国软科学, 2015, (5): 1—11.

[53] 陆铭. 建设用地指标可交易: 城乡和区域统筹发展的突破口 [J]. 国际经济评论, 2010, (2): 137—148.

[54] 郭杰, 包倩, 欧名豪. 基于资源禀赋和经济发展区域分异的中国新增建设用地指标分配研究 [J]. 中国土地科学, 2016, (6): 71—80.

[55] 夏怡然, 陆铭. 行政主导的人力资本均衡可否持续: 让历史告诉未来 [J]. 学术月刊, 2018, (5): 45—55.

[56] 梁文泉. 城市人力资本的分化: 探索不同技能劳动者的互补和空间集聚 [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双月刊), 2015, (3): 185—197.

[57] 张松林. 大城市限制低技能劳动力对人力资本外部性的影响——基于新兴古典经济学视角的分析 [J]. 人文杂志, 2019, (6): 47—54.

[58] 吴宁. 列斐伏尔的城市空间社会学理论及其中国意义 [J]. 社会, 2008, (2): 112—127.

[59] 陈宗胜, 康健. 中国居民收入分配“葫芦型”格局的理论解释——基于城乡二元经济体制和结构的视角 [J]. 经济动态, 2019, (1): 3—14.

[60] 陆铭. 城乡融合应实现人、土地、资金三方面的市场化改革 [J]. 国家治理, 2020, (1): 16—19.

[61] 王慧芳, 周恺. 2003—2013年中国城市形态研究评述 [J]. 地理科学进展, 2014, (5): 689—701.

[62] 赵宏, 何芬. 京津冀协同发展视角下北京城市空间布局优化研究 [J]. 经济与管理, 2017, (1): 17—21.

[63] 蒋希冀, 王静, 王兰. 基于多源数据的城市功能布局优化研究: 以上海市宝山区为例 [J]. 现代城市研究, 2020, (5): 2—9.

[64] 陆铭, 冯皓. 集聚与减排: 城市规模差距影响工业污染强度的经验研究 [J]. 世界经济, 2014, (7): 86—114.

[65] 郑怡林, 陆铭. 大城市更不环保吗? ——基于规模效应与同群效应的分析 [J].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 (1): 133—144.

[66] 陆铭. 治理城市病: 如何实现增长、宜居与和谐? [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19, (1): 22—29.

[67] Van, O. F., Burge, R.M., Raspe, O. On the Economic Foundation of the Urban Network Paradigm: Spatial Integration, Functional Integration and Economic Complementarities within the Dutch Randstad[J]. *Urban Studies*, 2010, 47(4):725—748.

[68] 刘胜, 顾乃华, 李文秀, 陈秀英. 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与制造业企业成长——兼议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政策红利[J]. *产业经济研究*, 2019, (3):52—62.

[69] Davis, D., Weinstein, D.E. Market Access, Economic Geography and Comparative Advantage: An Empirical Test[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03, 59(1):1—23.

[70] 吴福象, 蔡悦. 中国产业布局调整的福利经济学分析[J]. *中国社会科学*, 2014, (2):96—115.

[71] 赵可, 徐唐奇, 张安录. 城市用地扩张、规模经济与经济增长质量[J]. *自然资源学报*, 2016, (3):390—401.

[72] 张莉, 程可为, 赵敬陶. 土地资源配臵和经济发展质量——工业用地成本与全要素生产率[J]. *财贸经济*, 2019, (10):126—141.

[73] 王婧, 方创琳, 李裕瑞. 中国城乡人口与建设用地的时空变化及其耦合特征研究[J]. *自然资源学报*, 2014, (8):1271—1281.

[74] 兰利花, 田毅. 国土空间规划研究进展与展望[J]. *江西农业学报*, 2020, (9):134—142.

[75] 蔡昉. 中国经济面临的转折及其对发展和改革的挑战[J]. *中国社会科学*, 2007, (3):4—12.

[76] 张丽宾. “刘易斯拐点”尚未到来[J]. *中国发展观察*, 2010, (2):39—42.

[77] 周天勇. 中国城市化发展道路的选择[J]. *中共珠海市委党校珠海市行政学院学报*, 2010, (6):8—15.

[78] 瞿商, 赵俊红. 新中国人口政策的转变与经济增长[J]. *湖北社会科学*, 2015, (12):79—84.

[79] 王小鲁. 中国城市化路径与城市规模的经济学分析[J]. *经济研究*, 2010, (10):20—32.

[80] 余运江, 高向东. 中国流动人口空间分布格局与集聚状况研究——基于地级区域的视角[J]. *南方人口*, 2016, (5):57—69.

[81] 张耀宇, 陈利根, 陈会广. “土地城市化”向“人口城市化”转变——一个分析框架及其政策含义[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6, (3):127—135.

[82] 刘欢. 户籍管制、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与城市化——基于城市特征与流动人口监测数据的经验分析[J].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2019, (8):60—74.

[83] 程开明. 城市化、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基于创新中介效应的实证研究[J]. *统计研究*, 2009, (5):40—46.

[84] 刘晓光, 苟琴. 劳动力转移、技术进步与资本回报率变动[J]. *产业经济研究*, 2017, (2):76—87.

[85] Desmet, K., Rossi—Hansberg, E. Urban Accounting and Welfare[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3, 103(6):2296—2327.

[86] Desmet, K., Henderson, J.V. The Geography of Development within Countries[J]. *Handbook of Regional and Urban Economics*, 2015, (5):1457—1517.

[87] 蔡昉, 都阳. 转型中的中国城市发展——城市级层结构、融资能力与迁移政策[J]. *经济研究*, 2003, (6):64—71.

[88] 陈诗一, 刘朝良, 冯博. 资本配臵效率、城市规模分布与福利分析[J]. *经济研究*, 2019, (2):133—147.

[89] 赫曦滢. 马克思主义空间政治经济学的叙述逻辑及对当代中国的启示[J]. *经济纵横*, 2018, (12):16—22.

[90] Gibbons, S., Overman, H.G. Mostly Poinless Spatial Econometrics? [J]. *Journal of Regional Science*, 2012, 52(2):172—191.

[91] Annoni, P., Dominicus, L.D., Khabirpour, N. Location Matters: A Spatial Econometric Analysis of Regional Resilience in the European Union[J]. *Growth and Change*, 2019, 50(3):1—32.

[92] Kim, Y. R., Williams, A.M., Park, S., Chen, L.J. Spatial Spillovers of Agglomeration Economies and Productivity in the Tourism Industry: The Case of the UK[J]. *Tourism Management*, 2021, 82(8):1—13.

[93] 孙叶飞, 夏青, 周敏. 新型城镇化发展与产业结构变迁的经济增长效应[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16, (11):64—71.

[94] 罗胤晨, 谷人旭, 王春萌, 杨帆, 许树辉. 县域工业集聚的空间效应分析及其影响因素——基于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实证研究[J]. *经济地理*, 2015, (12):120—128.

[95] 陆铭. 诊断中国经济: 结构转型下的增长与波动[J]. *国际经济评论*, 2020, (6):22—38.

(责任编辑:姜晶晶)